

革命英雄的譜系

——《紅旗譜》評論集

“文艺报”編輯部編

作 家 出 版 社



革命英雄的譜系

——《紅旗譜》評論集

“文艺报”編輯部編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1120 字数 57,000 开本 787×1092 纸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5}{16}$ 插页 3

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,000册

定价 (4) 0.29元

出版說明

本書收集了报刊发表的評論介紹長篇小說“紅旗譜”的文章三篇，還有座談會發言的記錄三篇。作者寫的創作心得的文章，以及尚未發表過的作者和讀者有關這小說的通信，也收在書中。這本書可以供讀者讀“紅旗譜”時作為參考，可以幫助讀者更深刻地理解這部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。

“文藝報”編輯部

1958年9月8日

目 次

老战士話当年(1)

——“文艺报”举行“紅旗譜”座談会記錄摘要

壯闊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方 明(20)

紅旗手座談“紅旗譜”(36)

——河北省文联举行的“紅旗譜”座談会記錄

革命英雄的譜系胡 苏(62)

青春的解放黃天祥(75)

火种在年青的心中燃烧(80)

——河北保定师范学校学生座談“紅旗譜”

作者梁斌和小朋友殷国強的通信(91)

讀者給梁斌同志的信(97)

我为什么要写“紅旗譜”?梁 斌(99)

老战士話当年

——“文艺报”举行“紅旗譜”座談会記錄摘要——

时 間：1958年2月26日。

地 点：中国文联大楼文艺茶館。

出席人：

梁 斌 “紅旗譜”作者。

曹承宗 交通部監察局副局長。

張金錫 北京市建筑工程局材料处国拨科科长。

常 明 国家經濟委员会中共党委会書記。

臧伯平 机械工业部第七局副局長。

侯金鏡

侯金鏡：梁斌同志這本書，是写国民党白色恐怖統治时期北方农民高涨的革命斗争的，在讀者当中的反映很好。在座的各位同志，都曾参加过当年的斗争，对当时的斗争情况十分熟悉。所以，請大家来聊聊，老同志們一块話話旧，也好帮助我們丰富斗争知識、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。現在請梁斌同志先談談。

梁 斌：先介紹一下：大革命时代常明同志在博、蠡

一带建党，是当时博、蠡中心县委书记；曹承宗同志是当时蠡县财务局局长，在财务上对党的支持很大；在党内很有威信；臧伯平同志是保定二师学潮领导者之一，学校被围困时，他在里面坚持斗争；张金锡同志在博、蠡中心县委领导共青团工作，书里反割头税运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江涛，就是拿他作模特儿写的。（会场空气马上活跃起来）

当时我还是一个14、5岁的小学生（张金锡：他是我们班最小的）。我所以写这本书，是因为那时候在党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情绪非常高涨，感动了我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，尤其是保定二师学潮（“七六惨案”）中，许多战友牺牲了，他们在我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。到后来，觉得这些先烈、前辈们在领导这个地区的农民斗争中，对革命贡献很大，他们的斗争事迹也应该保留下来，传给下一代。这就是我写书的动机。不写出来就是欠了人民的债，写不出来的时候，就象有一根鞭子在背上抽。

在二师解散后到北京的第二年（侯金镜：1934年），我就学着写了，这时想写的心情很迫切。第一篇是个短篇，写高、蠡暴动，题目是“夜之交流”，在北师大的“伶仃月刊”第2期上发表。1934年以后，因为患神经衰弱没有写。1935年，想写个剧本，把这些同志的性格、灵魂进一步介绍出来，但仍然没有机会。一直到1942年“五一六扫荡”以后，才写出了个短篇：“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”。创作的动机来自这样一件动人的事：两个革命同志被敌

人杀害以后，他的父亲到冀中区来找区党委，要弄清他的儿子是怎样牺牲的，当时我看见这个老人神情很乐观，身体也矫健，谈笑风生，不象是死了两个儿子的人，我和这位老人也谈过话，很受感动，这时，朱老忠的形象就在我脑子里开始形成了。以后，老人的大儿子也死了，我就写了“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”，在冀中油印刊物上发表。1943年我又把“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”发展成为中篇，还是写朱老忠，但在题材上丰富了，从二师学潮一直写到抗战开始，约5万多字，在“晋察冀文艺”上发表。写了这篇东西，我自己还不满足，觉得同志们的革命斗争事迹很丰富，而我却写得这样少，所以我又想写长篇，觉得只有长篇才能把他们写出来。这时候我读到了毛主席的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”，这个文件给我的影响和教育很大，使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写不下去是因为缺乏锻炼。因此，我就到乡下去学著作地方工作，结果接触面广了，对农村也熟悉了，通过减租减息、反奸复仇、土地改革等运动，使我在群众中受到很大的锻炼。1952年土改完毕以后，我又考虑到这个问题，觉得年岁不小了，应该写了，就设法脱离工作，整理小说的提纲，从1953年开始正式动笔。一动笔写问题又来了：过去有一股朴素的热情，有冲劲，感到应该完成这个任务，但一动笔却觉得对以前材料更深一层的熟悉和更细致的研究都不够。所以，1953年底到1954年初，我就到北京来找常明同志、张金锡同志、

臧伯平同志……，旧話重提，取得了这些老同志的帮助。

以后，我又到高、蠡暴动会战的几个村子去观察、体验、訪問，回来后又繼續写。写到1956年底，一共完成了3部（第2部写高、蠡暴动；第3部写“七七事变”前后北方农村情况）。写到第3部身体不行了，就暂时停了下来。（侯金镜：3部都写完了？）写完了。5年来，我作的其他工作很少，专门写作。拿能力来说，我是写不出来的，由于党的教育、党的支持、老同志的帮助和文学界同志的指导，才使我很不熟练地写了出来。这个东西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。我写的还很不够，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，以后修改。

侯金镜：第2部、第3部多少字？

梁斌：和第1部差不多，都有30万字以上。

侯金镜：计划写几部？

梁斌：原计划写6部，第4部计划写冀中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，第5部写两面政策和地道战，再就写反蒋复仇……。现在因为身体不好，没有写。

侯金镜：把身体搞好，6部全写出来吧！（众笑声）大家聊起来吧。

曹承宗：我不但不会说“文学话”，就连普通话也说不好，所以，虽说是随便谈谈，也不知打哪儿谈起。

梁斌同志写这部小说，我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。在我最初听到“红旗谱”这三个字的时候，高兴极了，心里就有这样一个想法：希望当年在冀中的老同志们，都能读到

這本書。剛剛拿到這本書的那天晚上，我睡在被窩里，把書打開，才看了第一句——“平地一聲雷……”，就把我的思想一下子吸引住了。不知道是一種什么样的心理學上的原因，我當時喜歡得看不下去，脑子里總在想着：这里面有些什麼東西，这里面有些什麼東西……。

我的大女兒把這本書拿到學校里去看，她用很好看的紙把書皮兒包了起來。我說很好，我們要好好地看，好好地保存它。這不僅是因為書里的內容使我感到親切，也是對我們黨在北方的革命歷史的尊重。

我很少看小說。早年看過“水滸”和“太平天國演義”，從“水滸”里知道用人要走“宋江路綫”，那還是在1921年以前。另外還看過“三國演義”，從里面學些策略。這次看“紅旗譜”就不是這樣了。從“平地一聲雷”這幾個字兒起，就把我抓住了，看到寫反割頭稅運動的時候，更是深深地吸引了我，特別是那天晚上大貴捉住春蘭家跑失了的那只豬，給她送去的這一情節，給我很深的印象。這本書把我吸引住了，比我當年看“水滸”的那股勁兒還厲害，它把我這個多年不喜歡看小說的人改了樣兒，所以我說這部小說是成功的。

我知道有許多人喜歡這部小說。描寫30年代北方農村的革命鬥爭，這還是第一部長篇小說。在白色恐怖統治下的北方農村，階級鬥爭和階級分化是非常明顯的，即使是腦子再簡單的人，也能看得很清楚。這部小說拿

到农村里去，讓那些老年人、中年人和青年人讀一讀，對他們的思想是會有所啟發和幫助的。

，在當年那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里，象運濤、江濤這樣成份的人（家里從祖父、父親做長工起，慢慢熬成了中農，所以子弟還能念書，甚至也有供子弟上大學的），在當時參加了革命，這確乎是事實。有很多革命領導同志，就是從這樣的家庭出來的。今天，我們的黨已經掌握了政權。我們的一些從這樣的家庭、這樣的階級出身的幹部，雖然經過黨几十年的教育，但是思想和階級立場是不是都純了呢？當然，有些同志可以這樣講，一般的說來恐怕還不是這樣，還需要繼續提高思想。這本小說里所寫的領導當年革命鬥爭的同志，大多是從這樣的階級出身的。我認為這本小說對這樣一些同志今後不斷地提高思想意識，是有助於的。在我看來，這是很有價值的一點。以我自己來說，看了這部小說，回顧一下在黨的領導下走過來的路子，想想我們今後的更艱巨的責任，就不能不要求自己把思想再提高一步。我想，有不少的同志跟我的情況是類似的。

以上是我看了這部小說以後的感想。我就先談到這裡。

張金錫：這本書寫得很好，把白色恐怖統治下我們黨的領導、革命的力量、群眾對黨一步一步的認識都很好地寫出來了，對青年一代教育意義很大。我家里有兩

个上中学的孩子，他們也爭着看这本书。现在学校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。有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他們不知道我們今天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。所以梁斌同志写出这本书是很好的。（轉向梁斌說）我首先向你祝賀。

書里写反割头稅斗争，主要是通过江涛的活动，写江涛在群众大会上講演，严萍在台下呼应，这些地方都写得很活泼。但这次运动，当时在党的领导下，起主要作用的是乡村师范的同学们。我們全校52人，就有48个共青团員，一有活动就不上課了。我念了3年师范，一共才上了40几天課（笑声），有事就走了。要不是党的力量在我們那个地方很强，师范早就关了門了。那时在学校里，大家吃着飯就唱起国际歌来。隔一个門兒就是县公安局，当时就非逞这英雄不可，騎着牆冲着公安局唱国际歌。公安局里也有自己人。当时的国民党党部也是挂国民党的牌子干共产党的事兒。

常明同志那时是专职的党的工作者，也短不了上师范去。当时党布置要发动群众抗割头稅。这稅农民沒納过，不願納，能抓住这个机会发动群众。学校的共青团开了会，布置了一下，大家就分头回乡去活动，我是回北区。学校不能上課了，宣布提前放假。12月10日同学们回来彙报情况，估計12日能发动2万多人参加示威。彙报完了，离三、四十里地的都赶回本区作准备。到那天，确是滿街滿巷的人，城門都堵住了。不光是农民，城里人、富农、

比較开明的士紳……养得起猪的都参加了，发动的面很广。（常明：小土地出租者也参加了。）

这次运动是党领导的，搞得好，发动面兒寬，村公所一人发二毛錢去参加抗稅，党并没有出头露面。我們和包稅商打了两年多合法官司，过一堂就把他扣起来，要他交那包的4000块錢稅款。这次抗稅，党虽然没有暴露，可老百姓也都知道是党在领导。这次胜利，距离博、蠡暴动才两三个月，它扭轉了群众的失败情緒。群众明白了共产党是为誰的，党在博野、蠡县撒下了种子。我觉着，書里党的领导写得不够，应该加强点，师范学生們集体的作用也还不显，太偏重于江涛个人了，应该突出当时斗争的主流和集体的力量。

書里方言土語是不是用得太多些？我那姑娘是高中生，她就問我“脸骨拐”是什么。这样写，拿到冀中，大字不識的人也能听得懂，在別的地方怕要費些周折。

常明：反抗割头稅是那时搞群众运动最成功的一次，很受群众拥护。这次成功，和以前群众工作的基础是分不开的。博野、蠡县当时在华北来說是建党比較早的地区之一，1925—26年开始建党。群众斗争是从1928—29年开展的，抗割头稅在1930年，是群众斗争的高峰。当时先是扫盐斗争、打盐巡、反对盐加价，接着年关斗争、抗债，从一般抗捐抗稅发展到游行示威。（师范学生、高小学生差不多都搞宣传、散传单，警察看了也不干涉。）博野、蠡

县,1930年农历8月12日,根据立三路綫搞暴动(张金錫:晚上到你家拿大旗,記得吧?)(常明点头,笑声),准备起义、武装暴动,夺取政权,組織紅軍,成立苏維埃政府。当时准备了传单、人民政府布告,內定了軍长、政委等人选(郝清玉是苏維埃政府主席,张兆丰是紅軍軍长,我是政委),夜行軍的东西也准备好了。这次暴动,虽說因为路綫錯誤沒搞成,可是也有收获:打死一个地主的兒子,把地主粮食分給了穷苦农民,公开宣传了党的宗旨,扩大了政治影响。暴动失敗后,检查、总结了这次暴动的經驗教訓,以后回来就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,搞抗捐抗税。当时听說县政府要收杀猪税,经过我們党的县委开会研究,决定抓紧机会布置,发动群众公开反对杀猪税——割头税。喂猪自己吃还要割头税,群众都不乐意。时机抓得好,群众发动起来了。示威的群众围住了县政府,县长不敢出来,要群众派代表,大家說:“大伙兒的事大伙兒去,沒有代表”。后来县长沒办法,当众表示暂时緩收割头税,实际上不敢收了。(张金錫:“誰收税当地打死”,这書上写着,正是这样。)当时有农民协会的名义,大革命失敗以后不用这名称,抗税是用的农会名义。情况就是这样。

这些情况很需要写,應該写。梁斌同志写的虽不是当时革命斗争的全面情况,可是抓住了典型。保二师学潮影响很大,反割头税运动規模大、影响深,这都抓住了。会抓典型,会选择典型,是这部小說根本性的优点。

这么几年来，写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不多，梁斌这书补了这个缺。从党的利益、党的方针出发，应该抓这个。把过去的艰苦奋斗写出来有好处，让现在的青年们看看过去的共青团员是如何进行斗争的。梁斌根据实际需要，从1953年起到1957年，苦干5年写出了3部书，不容易啊！这种决心、这种努力、这种雄心，也值得表扬，值得学习。这书写得很深、很动人，写作技巧、文笔都好。三个“性”——准确性、深刻性、生动性，都基本上达到了。缺点不能说没有，不过优点、成功是主要的。小毛病、小缺点，再考虑修修，就更好。要改的地方，一个是党的领导作用写得不够明显，再一个是群众的活动面不宽，描画得不够。

侯金镜：写党的领导，你看要从哪些方面再加强？

常明：书里写的骨干是江涛，但是对他和党和其他同志们的关系还写得太少。抗税运动的胜利，实际上主要是在于党的领导和同志们集体的努力。再说贾湘农，书里有一段写他一个人改完作业后，想着想着就起革命令、写起指示来。这样写，也有问题，不能表现当时党组织的集体领导的力量。湘农也好，江涛也好，当时要找几个人开个会、商量商量，还是可能的，方便的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很多活动，象如何指示、如何布置工作，过常都是通过县委开会研究才决定的。

这本书总的说很好，缺点不多，就是应该把党的领导

和当时的群众活动多写一写。“文艺报”重视这部书，我很满意。（常明同志另有重要会议，他讲完以后，便提早退席，大家与他握别。）

张金锡：抗税运动的情况和意义还可以多写一写。群众大会上开来许多警察，当时拿着大红旗的老宋同志临时提出要大家等警察退了再散，这是最成功的一着。这个临时决定，使警察被动，保证了运动的全胜，否则很多人就要被警察抓去了。这次运动的中心是乡村师范的学生，运动过后5分钟学校就被包围，军警向学校要人，学校方面说早放假了，校外活动学校概不负责，使军警毫无办法。

曹承宗：刚才常明、张金锡两同志把当年斗争的情况谈得很准确，现在我再补充一点，等会儿臧伯平同志谈保二师学潮的情况，由他“压大轴”。（笑声）

拿蠡县来说，当时蠡县的统治阶级，也就是那班土豪劣绅，和别的县比较起来，不但不老实，相反的，是特别厉害。军阀当中的某要人就是蠡县人。那时有个“保定军官学校”，那里的学生大多数是蠡县籍的，这些人出来都是军官，退伍后回到家里，势力非常大。反动统治势力既然这样大，为什么我们革命力量在这一带又非常活跃呢？这一点是要说清楚的。

在博、蠡中心县委领导下，蠡县的党一开始就通过我们的党员把国民党党部掌握在手里，那就是所谓“跨党运

动”。国民党党部里的这个部长、那个部长，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，只有一个象现在的办公室主任的人例外。掌握了国民党党部，我们的斗争就可以合法化了，因为那时的县长要听国民党党部的話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把当时蠡县的政权也变了个样，县政府里，除了公安局长规定由省里委派以外，其他掌权的都是共产党员或同情共产党的人。我是当时的财务局长，其他如建设局长、教育局长……以及师范、完全小学校的校长，教员等等，都是我们的人。完、唐暴动失败以后，有很多同志跑到蠡县来，党就把他们安置在师范或小学里当教员。就是在公安局里，除了局长以外，下面一直到警察也都是我们的人，那里的教练，表面上是旧绅士，实际上也是听我们的話的。又象各区公安分局的局长、区公所的人，也是我们的人；再往下，200多个村子的村长、保长，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我们的人，有的就是共产党员。通过“跨党运动”，我们就把这个县政权变成红色的了，因此，我们要怎样干就怎样干。如果换一个别的地方，政权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，也象这么个干法，我们的人就立刻会被搞光。

抓住县政权，进行合法斗争时，最主要的当然是党的领导。另外还有一个组织，那是在合法斗争中产生的，一个区有四个代表。在当时，我们还不知道统一战线的政策，这个组织，实际上也就是统一战线。

有一次，我被当地的劣绅们告到省长那里去了，状子